



韋莊集注

(唐) 韋莊 撰

李誼 校注

總編纂 舒大剛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 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號）

韋莊集注

（唐）韋莊 撰
李誼 校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謝正強
責任校對:郭鴻玲 袁 捷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文化 鄒小工
責任印製:王 焯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韋莊集注 / (唐) 韋莊撰; 李誼校注. —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90-0723-7

I. ①韋… II. ①韋… ②李… III. ①韋莊 (836—
910) — 唐詩 — 注釋 IV. ①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46128 號

書名 韋莊集注

撰 者	(唐) 韋 莊
校 注	李 誼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90-0723-7
印 刷	四川和樂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張	31.25
字 數	66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90.00 圓



◆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 網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撰寫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群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侮、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陳壽、常璩、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李心傳、魏了翁、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

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軾（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張栻（著《南軒易說》）、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箍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忻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爲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爲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吳船錄》和《驛程記》。洎乎近世，郭沫若、巴金，蔚爲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群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

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為“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欽、舜元，俱善詩文，號稱“銅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

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刊印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激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

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蘇擁簪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荆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李誼簡介

李誼 研究員、教授。原名李根顯，筆名曉里，重慶市潼南區人。1935年2月出生，1950年參加工作，1951年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歷任成都杜甫紀念館負責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所副所長、所長，中共文學所支部書記等職。并兼任四川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四川巴蜀文化研究會理事、地方文史專業委員會負責人和叢書編委會委員。1998年，曾受聘為《中華人物辭海》（當代文化卷）特邀顧問編委。2014年9月，經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社科聯和四川大學聘請為《巴蜀全書》編纂委員會學術顧問。

長期從事中國古代詩詞的整理、研究。自1978年以來，除多次組織、參與外國漢學家來成都開展有關中國唐代文學的學術活動與學術交流外，還撰寫唐宋文學、歷史和蜀詞的研究論文和賞析文章數十篇，先後在大陸及港臺的文集和刊物上發表，均受到好評。與此同時，還陸續出版編選、注釋、集校中國古代詩詞的著作多部。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杜甫草堂詩注》，曾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並榮獲1984年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科研成果三等獎。1986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分別出版《花間集注釋》和《韋莊集校注》，受到幾十年前作過《花間集注》的老專家河南大學華鐘彥教授和著名語言學家四川師範大學徐仁甫教授的稱道以及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葉嘉瑩教授的贊賞。其中，《韋莊集校注》曾獲四川社科院第三次優秀科研成果獎。1987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四川歷代山水詩選注》（合作）。1992年由臺灣正中書局出版《禪家寒山詩注》，此書被該局列入“中國古典文學系列”，在世界範圍內發行，並成為臺灣設立的“大陸圖書著作個人金鼎獎”的推薦著作，還獲四川社科院第五次優秀科研成果獎。1992、1994年，先後由重慶出版社以百萬基金資助出版《歷代蜀詞全輯》及《歷代蜀詞全輯續篇》（2007年該社又對兩書進行了再版），曾受到廣大詩詞愛好者的歡迎。2013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歷代書畫題詠詩選注》（六朝至五代）和《歷代書法題詠詩選注》（三國至晚清）。同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蝸廬存稿》（文集）。2015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歷代書畫題詠詩選注》（宋朝）。此外，2010年5月還榮獲由中國名家書畫院、北京人民畫院和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2010世界華人慶祝上海世界博覽會開幕暨首屆中國名家世博藝術杰出成就獎”。

其事跡曾分別收入《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當代中青年社會科學家辭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家辭典》（由韓國出版）和《中華人物辭海》以及《世界名人錄》等。

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韋莊的名字人們並不陌生。他不僅是唐末五代成就突出的詩人，而且是頗負盛名的詞作家。他同花間詞派“鼻祖”溫庭筠齊名，故“世以溫韋並稱”（顧憲融《詞論》）。

韋莊一生，先逢黃巢農民大起義，後遭藩鎮軍閥大混戰，是在“海爲深谷岸爲蹊”（《贈雲陽縣裴明府》）的劇烈政治動亂中度過的。他長期顛沛流離，飽經憂患，仕途坎坷，鬱不得志；後雖“晚達”，卻爲時甚短。正是由於這種不幸際遇，才使他接觸到一些社會現實，受到不少磨煉，並且接近了人民，從而情有所感，發而爲詩，寫出了不少憂國憂民、感世傷時的優秀篇章；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突出矛盾、傷亂現實以及民間疾苦。加之，韋莊在創作過程中始終堅持忠於事實，注重感情，刻意求工的嚴肅態度，所以他的作品樸素平直，情深句秀，格調新穎，膾炙人口，對後世產生了較爲深遠的影響。

（一）

韋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人，是初唐宰相韋待價的裔孫。韋氏在隋末唐初是世家大族，出了幾個風雲一時的人物，曾顯赫一時，深得李唐王朝的寵重。但是到了韋莊出世的晚唐，這個家族業已衰敗沒落。韋莊生於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卒於蜀高祖武成三年（910），終年七十五歲。他主要生活在晚唐的宣、懿、僖、昭宗四朝及五代初期。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繁榮昌盛的大唐王朝衰微滅亡，並進入五代十國分裂紊亂的時代。這時統治集團內部朋比結黨，互相傾軋，而最高當權者又外制於強藩，內牽於閹寺，以至朝政腐敗，危機四起，兵連禍接，民不聊生。生於其時、年紀尚輕的韋莊，當然無例外地要受到亂世的影響。他幼住長安，繼僑下邳，又寓鄂、號，頻繁遷居，不但功名前途杳茫，而且生活也很貧困。據史書記載：“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太平廣記》卷一六五），他“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唐才子傳·韋莊》）。韋莊自己也曾承認：“性爲無機率，家因守道貧”（《曲江作》）。儘管他處境艱難，生計窘迫，但他仍然有志於功名事業，並希望在亂世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匡扶社稷的抱負。韋莊在自己的詩中，就明白表示過這種願望：“平生志在匡堯舜”（《關河道中》）、“有心重築太平基”（《長年》）。他還力圖通過應舉的辦法，獲得官職，來實現政治理想。韋莊雖然年輕時就富於文學才華，他“幼能詩，以艷語見長”（《十國春秋·韋莊傳》），然而由於權貴把持朝政，壟斷仕途，無人援引，他曾應舉進士達四、五次之多，終因“要路無媒”（《下第題青

龍寺僧房》)，均不及第，得到的結果竟是：“帝里無成久滯淹，別家三度見新蟾”（《冬日長安感志寄獻虢州崔郎中二十韻》），“皆乘駿馬先歸去，獨被羸童笑晚眠”（《癸丑下第寄新先輩》）。這說明當時韋莊縱然有滿腔報國熱情和出衆的濟世才能，企圖通過應舉獲得一官半職以實現其理想，真是談何容易！特別是唐僖宗廣明元年（880），他四十五歲時再至長安應舉，適值黃巢攻破京都，韋莊陷於兵火，一度弟妹失散，自己又身患重病，差點在此死掉。這正如他在自己詩中所說：“與君同卧疾，獨我漸彌留。弟妹不知處，兵戈殊未休。”（《賊中與蕭韋二秀才同卧重疾二君尋愈余獨加焉恍惚之中因有題》）由此可見，韋莊的仕途是多麼崎嶇坎坷！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韋莊由於階級偏見，舉家逃離黃巢起義軍佔領的長安，他經陝州，客洛陽，然後流寓江南。爲了求食、求仕和求生，韋莊曾南抵鎮江、東陽，西到三衢、兩湖，行程萬里以上，遍跡大江南北。他這次江南之行，始於唐僖宗中和二年，終於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歷時十幾年的漫長歲月，一直是在艱險的生活道路上奔波，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中掙扎。韋莊在離亂漂泊中的種種艱辛，在客居窮困中的憂愁痛苦，是常人所難以想象的。所謂“往來千里路長在，聚散十年人不同”（《關河道中》）和“多病似逢秦氏藥，久貧如得顧家金”（《寄湖州舍弟》）等詩句，正是他流離顛沛，貧病交加生活的寫照。

直到唐昭宗乾寧元年（894），韋莊五十九歲獲“蘇儉榜進士，釋褐校書郎”（《唐才子傳·韋莊》）之後，才結束了他長期流離漂泊的生活。乾寧四年（897）他六十一歲，被辟爲判官奉使入蜀，歸朝後升任左補闕，曾奏請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天祐元年（901）六十六歲，在西蜀爲王建掌書記，自此終身仕蜀。天祐三年（906）七十一歲，爲安撫副使。天祐四年（907）七十二歲，他助王建稱帝，建立前蜀割據政權後，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制定“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蜀檣机》卷上）。蜀高祖武成元年（908），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武成三年（910）八月，七十五歲的韋莊卒於成都花林坊，葬於白沙（今四川省灌縣境）之陽，謚曰文靖。這說明韋莊顯達的時間並不長，在前蜀這個割據小朝廷中做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不過三年左右而已。

韋莊的一生，可說是艱難曲折而又不斷奮鬥掙扎的一生。他雖出身世家大族，却長於亂世之秋。韋莊家道中落，自幼貧困，仕途艱虞，屢試不第。爲了逃避戰亂，他長期流亡，浪跡江湖，不僅虛耗了寶貴的年華，而且也飽嘗了亂離的痛苦。正因爲頻繁的戰亂，把他卷入了社會的底層，使他與難民爲伍，同貧士、山僧相交，所以才有可能熟悉當時的社會瘡痍，瞭解動亂中人民的疾苦。雖然韋莊晚年出任宰相，爲“晚唐詩人之顯者”（《詩藪·雜編》卷四），但他對社會弊病仍然採取“直言無隱”（《十國春秋·韋莊傳》）的態度，對人民痛苦也寄予同情與關心。他爲王建掌書記時，在彈劾一縣令乘時擾民所擬的草牒中說：“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唐詩紀事·韋莊》）竟成爲流行一時的佳話和廣泛傳誦的名言。故史家稱頌他“不恃權，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蜀檣机》卷上）。韋莊一生不平凡的經歷和幾十年的親身感受，成爲他進行文學創作極爲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物質

基礎。

還須要特別指出的是，韋莊的文學創作還受到杜甫、白居易等前輩詩人的影響。我們都知道，韋莊比杜甫要晚出世一百多年，可是他們在政治思想、仕途活動以及一生際遇等方面，却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韋莊同杜甫一樣，憂國憂民，傷時感世，都是唐王朝的忠實維護者。他反對黃巢起義同杜甫反對“安史之亂”，雖然客觀效果殊異，然而他們的主觀願望都是出於“忠君”或愛國，在這一點上兩位詩人却又相同。而作為晚輩的韋莊，對杜甫則始終是推崇備至，仰慕不已的。他曾把杜詩列為自己所編《又玄集》一百五十名唐代詩人作品的首位。韋莊也像杜甫生前自稱“杜陵野客”一樣，常以“杜陵歸客”（《章江作》）自居。他於天復二年（902）六十七歲時，在成都“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因命芟夷，結茅為一室，蓋欲思其人而成其處”（韋藹《浣花集序》），並寓居於此，直到離開人世。為了表示對杜甫的由衷景仰，還把自己的詩作“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浣花集序》）。甚至在臨終之時，韋莊仍念念不忘杜甫的詩篇，“後（莊）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吟諷不輟”（《唐詩紀事·韋莊》）。這都說明韋莊所以能寫出不少憂國傷時的詩篇和大量筆調清新的作品，同他對杜甫懷有特殊感情並把杜甫及其詩歌作為自己的楷模，是分不開的。所以，清代詩論家余成教認為：韋莊“《憶昔》、《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題姑蘇凌處士莊》……諸詩，感時傷舊，頗似老杜筆力”（《石園詩話》卷二）。至於白居易對韋莊的影響，也是明顯的。韋莊幼年僑居的下邳縣，就是白居易的故鄉。“居易此時尚健在，端已為詩學居易，固由身世近似，幼時環境感染，或亦其一因也。”（夏承燾《韋莊年譜》）因此，韋莊詩的風格與白居易的詩有頗多相似之處，以至後人在編輯他們的作品時，還發生混淆作者的情況。韋莊的《秦婦吟》長達238句，1666字，是唐代古詩中最長的一首。其內容這裏我們姑且不論，但它在敘事、布局以及聲韻等方面，却酷似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而其題材獨特，內容生動和沈鬱頓挫等，似乎還略勝一籌。可見，韋莊學習他的前輩詩人是極其認真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總之，韋莊自身曲折的生活經歷、長期的社會實踐和前輩詩人的影響以及對其詩作的借鑒等，都是他從事文學創作並能寫出優秀作品極其重要的條件。

（二）

韋莊的詩，流傳至今者尚不足原作的三分之一。四部叢刊影印明人朱承爵刻本《浣花集》，編為十卷，詩二百四十九首（其中卷一雖標為四十八首，實為四十五首，向迪琮所校《韋莊集》亦從其數，乃虛增三首，現已除去），補遺二首，計二百五十一首，《全唐詩》補六十八首（本為七十首，有兩首與朱本重複，亦予減出），此次校注，又另補四首（據貫休《禪月集》、《永樂大典》、《金陵梵刹志》以及敦煌寫本各一首）及殘句數聯，合計三百二十三首。而韋莊自己在《乞彩牋歌》中說：“我有歌詩

一千首”，可知其散佚不少矣。儘管他傳下的詩作數量並不多，但它們仍然是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這些詩篇的思想內容和寫作動機，他的弟弟韋藹曾作過恰當的概括。他說：韋莊之詩，係“流離漂泛，寓目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制。或離群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愁之文，一詠一觴之作”（《浣花集序》）。這就說明韋莊的詩，不是無病呻吟，除極少數逢場作戲的應酬之作外，絕大部分作品確實都是寓目緣情，因事而發，同當時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繫。

韋莊的詩，揭露了統治集團的荒淫腐朽。衆所周知，“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早已開始了分裂衰微的歷史過程，特別到了晚唐，宦官專權，朋黨鬥爭，政治腐敗，尤其作為最高當權者的皇帝，更是奢靡無度，為所欲為。他們沉湎於聲色犬馬，根本不問朝政大事。比如唐懿宗就極其荒淫殘暴，他“好音樂宴游……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資治通鑑》卷二五〇）。咸通十四年（873），他為了到鳳翔法門寺迎佛骨，曾“廣造浮屠、寶帳、香輦、幡花、幡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資治通鑑》卷二五一）。又如唐僖宗以昏童繼位，當皇帝時才十二歲，他“專事遊戲，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庫空竭”（《資治通鑑》卷二五二）。正是由於他們驕奢淫欲，享樂腐化，不顧人民死活，才直接導致了唐末農民大起義，使唐王朝岌岌可危，政權搖搖欲墜。韋莊面對統治階級行將滅亡的現實，撫今追昔，不勝感慨，對他們窮奢極欲的罪行進行了無情揭露。他在《咸通》詩中說：

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
破產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
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遊回璧月斜。
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

唐代的統治階級似乎早就知道要天下大亂和大禍臨頭，所以在咸通時代就匆匆忙忙不顧一切地尋歡作樂。他們為“競留天上樂”和“爭買洞中花”，簡直達到了瘋狂的程度。詩人在這裏依據歷史事實，不僅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時社會弊病的癥結——奢，而且其矛頭所向，直指最高統治者的懿宗皇帝，這當然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又如《寓言》詩：

黃金日日銷還鑄，仙桂年年折又生。
兔走烏飛如未息，路塵終見泰山平。

韋莊富於哲理的詩句和語言，斥責了統治者的揮霍無度和窮奢極侈。他還用兔、烏不息，泰山變平的深刻道理，預示統治階級的肆意驕奢，必將無法擺脫其滅亡的命運。再看《觀獵》詩：

苑牆東畔欲斜暉，傍苑穿花兔正肥。
公子喜逢朝罷日，將軍誇換戰時衣。
鶻翻錦翅雲中落，犬帶金鈴草上飛。
直到四郊高鳥盡，掉鞍齊向國門歸。

韋莊在這裏既描繪了公子、將軍遊獵並獲得了不少飛禽走獸的盛大場面，又點出了他們“喜逢朝罷”，無心朝事和恣意玩樂的事實，這同樣是對統治集團腐朽奢靡的指斥和諷刺。

韋莊還在《憶昔》里嘲諷了統治階級一味追求享樂，而不居安思危；在《延興門外作》中，斥責了王孫公子和豪貴美人的狎戲與遊玩；在《貴公子》、《南鄰公子》以及《少年行》諸篇裏，譴責了統治階級的空虛無聊和肆意遊樂。詩人的這類作品，在反映當時的現實生活和暴露晚唐的黑暗社會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因而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韋莊的詩，譴責了藩鎮軍閥的分裂割據。藩鎮割據，在唐代歷史上是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是唐代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大地主集團不斷壯大的產物。藩鎮軍閥出現於玄宗開元、天寶之際，發展於肅宗、代宗之交，釀成大禍則是唐末、五代。到了晚唐之世，由於皇帝“常恐生事，一郡一鎮，有兵必姑息之”（李肇《唐國史補》卷中），藩鎮軍閥因此更加惡性膨脹起來。他們“雖稱藩臣，實非王臣”（《舊唐書·李懷仙傳》），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並，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新唐書·方鎮表序》）。這樣一來，使唐朝中央政權“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群盜，身播於九夷”（《舊唐書·田承嗣傳》），最後終於導致大唐帝國的分裂瓦解。唐代不少著名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都在自己的作品裏對藩鎮勢力分裂割據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斥責。面臨藩鎮軍閥不斷坐大和中央集權嚴重削弱的現實，韋莊也寫了不少詩篇給予了無情的譴責。比如《喻東軍》：

四年龍馭守峨嵋，鐵馬西來步步遲。
五運未教移漢鼎，六韜何必待秦師。
幾時鸞鳳歸丹闕，到處烏鳶從白旗。
獨把一罇和淚酒，隔雲遙奠武侯祠。

這是說黃巢起義軍攻破長安、唐僖宗逃亡成都之後，當時擁有重兵的武寧節度使時溥聲稱，“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舊唐書·時溥傳》），而僖宗因以武寧節度使命之。其實他們久屯洛陽，根本未至京師，所以在詩裏韋莊一方面對時溥等藩鎮軍閥心懷鬼胎、不進關鎮壓農民起義表示不滿，這當然是我們所不取的；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藩鎮勢力壯大及其嚴重影響的憂慮，因而嚴厲指斥他們：“鐵馬西來步步遲”、“六韜何必待秦師”以及“止竟有征須有戰，洛陽何用久屯軍”（《贈戍軍》）。又如《觀浙西府相畋遊》：

十里旌旗十萬兵，等閒遊獵出軍城。
紫袍日照金鵝鬥，紅旆風吹畫虎獐。
帶箭彩禽雲外落，避雕寒兔月中驚。
歸來一路笙歌滿，更有仙娥載酒迎。

這是詩人爲嘲諷獨霸一方，驕橫跋扈的周寶而作的，他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詩中生動地刻畫出他擁兵作樂，奢侈畋獵，野心勃勃的醜惡嘴臉。這同杜甫在諷諭東川留後、梓州刺史章彝不顧家國安危，進行“夜發猛士三千人”的遊獵

“豪舉”而作的《冬狩行》有異曲同工之妙。再如《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

滿耳笙歌滿眼花，滿樓珠翠勝吳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間富貴家。
繡戶夜攢紅燭市，舞衣晴曳碧天霞。
卻愁宴罷青蛾散，揚子江頭月半斜。

這是韋莊以自己所見所聞備寫周寶（金陵府相即是周寶）的豪華奢侈和歌舞酒色的腐朽生活。其意境與杜甫“似諛似諷”的名篇《贈花卿》，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它們都是為諷刺藩鎮割據勢力這個相同目的而作的。

藩鎮軍閥之間還經常發生戰爭，給廣大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據史書記載：昭宗景福年間，“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資治通鑑》卷二五九）。韋莊的《過揚州》詩就反映了這一事實：

當年人未識兵戈，處處青樓夜夜歌。
花發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風多。
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
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

詩人把揚州昔日的繁華同眼前的殘破進行了鮮明的對比，並以淮王升仙與煬帝無道，比喻藩鎮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禍害和給揚州造成的破壞，這就使詩的寓意愈加深刻，譴責之義也更突出。顯然，韋莊對藩鎮割據勢力這種鮮明立場，符合人民的意願，因而是應當加以肯定的。

韋莊的詩，反映了晚唐社會的衰微破敗。唐王朝進入晚唐時期，經濟殘破，民生凋敝，社會矛盾突出。戰亂經久不息，在各方面都出現衰敗的景象。韋莊在比較多的篇什里，反映了這方面的內容，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感情。比如《長安舊里》：

滿目牆匡春草深，傷時傷事更傷心。
車輪馬跡今何在，十二玉樓無處尋。

詩人在這裏雖然說的是舊居的殘破：滿目春草，車馬跡滅，玉樓難尋，令人傷心；其實是對整個晚唐社會破敗的形象刻畫和唐王朝風雨飄搖的生動描繪。《過舊宅》詩也是如此：

華軒不見馬蕭蕭，廷尉門人久寂寥。
朱檻翠樓為卜肆，玉欄仙杏作春樵。
堦前雨落鴛鴦瓦，竹里苔封螭螭橋。
莫問此中銷歇事，娟娟紅淚泣芭蕉。

韋莊在此所寫，當然不僅僅在於華軒不見，門人寂寥，翠樓改成卜肆，仙杏已作春樵之類的舊宅荒涼的表面現象，而是以極其沉痛的心情，暗示了唐王朝這座封建大廈已是柱斜樑歪，破屋頹垣，即將崩潰倒塌的實質。詩人曾親身經歷過十年的黃巢農民大起義，盡管由於他的階級偏見和對唐王朝的愚忠而反對這次起義，所以曾在有的作品里，對農民的革命行動進行過詆譭與攻擊，這是應當加以批判的；但是，他的不

少詩篇，却比較真實地記錄了動人心魄的戰爭場面和戰亂蕭條的殘破圖景，相當形象地補充了歷史記載的缺佚。比如《辛丑年》：

九衢漂杵已成川，塞上黃雲戰馬閑。
但有羸兵填渭水，更無奇士出商山。
田園已沒紅塵裏，弟妹相逢白刃間。
西望翠華殊未返，淚痕空濕劍文斑。

詩人從大處落筆，不僅寫出了“九衢漂杵”的戰爭場面和“田園沒於紅塵”，“弟妹逢於白刃”的動亂情景，而且從“戰馬放閑”、“羸兵填水”的描寫中，慨歎朝中無人，在客觀上暴露了唐王朝虛弱腐朽的本質。至於中和三年（833）詩人所作的敘事長詩《秦婦吟》，雖然迄今為止對其評價褒貶不一，尚有爭議，但此詩在當時業已家傳戶誦，頗有名氣。以至韋莊本人也被“時人號‘《秦婦吟》秀才’”（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這首詩是假託一個被起義軍俘虜的少婦的自述，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黃巢起義軍攻佔長安以及同“官軍”反復爭奪“皇都”的經過；描述了長安城經歷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這次生死較量後所呈現的蕭條破敗的景象；同時也較為真實地暴露了統治階級在農民戰爭的衝擊下，土崩瓦解，一敗涂地的虛弱本質。因此，這首詩是韋莊採取史筆和詩情相結合的手法，描繪出來的晚唐歷史畫卷。它幫助我們形象地瞭解唐末農民大起義的主要情況、攻佔長安的經過以及晚唐社會的黑暗衰敗等，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很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韋莊的詩，還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如前所述，由於長期避亂流亡，使韋莊同下層人民有更多的接觸和瞭解。所以他也作過一些同情人民的詩篇。比如詩人在《秦婦吟》中就刻畫了一個勞動者形象的老翁：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
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
……
老翁暫起欲陳詞，却坐支頤仰天哭。
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
……
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
……
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
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
朝饑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韋莊還通過老翁之口，慷慨陳詞，不僅叙說了自身的不幸遭遇，而且控訴了“官軍”掠奪民財的罪行。從而也表現了詩人自己對戰亂的詛咒和對人民的同情。又如《憫耕者》：